

## 男性性別意識之形成<sup>(1)</sup>

畢恆達

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台灣男性研究的出現還不到十年的時間，針對男人性別意識所進行的學術研究更是闕如。本論文即企圖理解處在一個性別歧視的父權社會中的男性如何去關心性別議題，進而形成性別意識。本研究訪談了 19 位參與性別課程與活動的男性，發現男性性別意識形成主要的根源分別是：1. 傳統男性角色的束縛與壓迫，2. 女性的受歧視與受壓迫經驗，3. 重視平等價值的成長經驗。然而受壓迫的處境必須要有女性主義論述來解讀。至於男人是否持續參與性別論述與運動，則是針對：1. 男性/個人利益，2. 關係利益，3. 政治利益，這幾種利害關係權衡的結果。這七個面向，並沒有有一種固定的線性關係，而是彼此相互影響。性別意識形成歷程就在此互動關係下不斷進展，永無休止。

**關鍵詞：**性別意識、男性研究、女性主義

西方男性意識喚醒團體與男性運動起因於對於 1960 年代婦女解放運動的回應，然而回應的立場卻南轅北轍。以男性運動為例，就有提倡男權 (men's rights)、神話 (mythopoetic)、支持女性主義 (profeminist)、男同性戀、社會主義等對於性別結構與處境提出截然不同解釋的各種派別 (Clatterbaugh, 1997)。而學術界，在婦女研究盛行之後，也有男性研究的出現做為回應。過去的學術研究，無論是研究者或研究對象幾乎都是男人，女人的經驗不但受到忽視，而且被視為對應於主流男性主體經驗的他者。女性主義的研究，並不是將性別當作研究中增加的一個變項，而是挑戰既有的自以為客觀中立的傳統主流男性論述，並強調研究的立場與觀點，進而希望藉由研究改變社會中的性別結構與女性的處境。當女性議題的研究日益增多，相對地以男性為焦點的研究就愈顯不足。如果女人不是天生的 (is not born)，而是形塑而成的 (is made)；同樣地，男人也不是天生的。有些研究者因此嘗試研究男子氣概形塑的歷程。而在一個父權社會中，有些不符合所謂男子氣概標準的男人，也開始質疑主流異性戀性別價值系統對於他們所造成的壓迫 (Morgan, 1992)。也有研究者認為如果不研究男人，沒有鼓勵男人參與性別改造運動，則社會不可能達致性別平等。廣義來說，受到女性主義衝擊之後，以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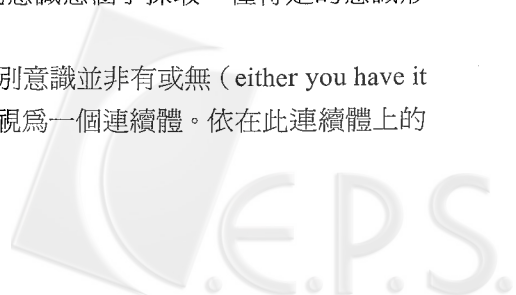
人為研究焦點的研究即為男性研究，但是有許多學者（如 Brod, 1987; Canaan & Griffin, 1990）提醒，男性研究者不應該忽視或者模糊了女性主義者所提出的性別權力問題。

台灣男性研究的出現恐怕還不到十年的時間，研究者也非常有限。既有研究所關心的議題，大致可歸類為以下三種。第一種男性研究集中在父職與家務勞動的探討（如王舒芸、余漢儀，1997；王叢桂，2000；李芳如，2001）。第二種研究以進入所謂「女人工作領域」的男人為對象，如社會工作（葉明昇，1999）、護理（徐宗國，2001；楊政議，1998）、家政（李惠恩，2002）、小學教育（陳佑任，2002）。第三種研究著重分析傳統男子氣概的建構（如王世哲，2000；秦光輝，1997；陳若璋、劉志如，2001；黃淑玲，1999；裴學儒，2001）。然而探討女性主義或婦女運動對男人性別意識所造成之影響的學術研究卻極為缺乏（王雅各，1998）。本論文即企圖理解，處在一個性別歧視的父權社會中的男性如何去關心性別議題，進而形成性別意識。

## 文獻回顧

首先，有幾個相關的概念必須先加以說明與釐清，包括性別認同（gender identity）、性別意識（gender consciousness）與女性主義意識（feminist consciousness）。Gurin 與 Townsend（1986）認為「認同」意指一個人意識到自己為團體的成員，對於身為成員具有感情連結；而「意識」指的是成員對於所屬群體在社會上之位置所具有的意識形態。群體意識的內涵包括對於全體相對擁有權力、物質資源與優勢位置的集體不滿；對於群體在一個階層化社會中擁有特權或權力受剝奪的合法性提出評估；相信集體行動為實現群體利益之所需。同樣地，Wilcox（1997）認為性別意識指的是對於性別的認定（identification）、對權力的不滿、對體制的譴責與集體行動的認識，性別意識並不必然指涉某一種特定意識形態。例如自由主義女性主義者會主張採取集體行動以去除法令對於性別平等的藩籬，進而彌補女性在社會上的不利情境。然而具有性別意識的反女性主義者（anti-feminists）則有可能認為有關於阻礙離婚、鼓勵傳統家庭的相關法令是對於女人的保障。因此這些學者認為女性主義意識意涵了採取一種特定的意識形態，因而是性別意識的子集合。

Gerson 與 Peiss（1985）又進一步指出性別意識並非有或無（either you have it or you do not）的問題，我們應該將性別意識視為一個連續體。依在此連續體上的



不同位置，可將性別意識分為三種型態，分別是性別覺察（gender awareness）、女性/男性意識（female/male consciousness）與女性主義/反女性主義意識（feminist/anti-feminist consciousness），而性別覺察為接下來二種意識發展所必須。性別覺察牽涉了對於既有性別關係系統不具批判性的描述，人們接受了現存社會對於性別的界定，認為它是本然（natural）而無法避免的。將對於現狀的不滿個人化，認為是個人的問題。例如一個女人無法獲得某項工作，她會認為是個人能力不足，而不是雇用過程中性別歧視的結果。對於性別安排會有小的不滿，但是還不致於質疑性別系統。女性/男性意識建立在性別覺察的基礎上，從性別覺察階段對於男女對應特質的表面描述，至此認識到了其中男女相互的權利與責任關係。而女性主義/反女性主義意識則是一種意識形態，對於性別關係系統採取非常清晰的挑戰或防衛，同時共享群體認同，並逐漸政治化而導致社會運動的產生。

同樣地，Downing 與 Roush（1985）也提出女性主義認同（feminist identity）發展的階段論。第一階段是被動接受（passive acceptance）。女人或者是沒有覺察或者是拒絕承認個人、機構與文化性別偏見，以及其所受到的歧視。亦即接受傳統的性別刻板角色，小心避免因做為女人而感到沮喪。第二階段是揭露期（revelation）。經由一個或一連串發生的矛盾或危機，女性終於不能再加以忽視。這些事件包括參加意識成長團體、離婚或申請信用卡遭拒等。雖然有的人是在一夕間過渡到此階段，但是大多數人都要經歷過一連串的事件。此後，女性對於性別現象採取了不同的參考架構來詮釋。第三階段是嵌入/發散期（embeddedness-emanation）。大多數女人經歷參與婚姻、工作、養育小孩等主流性別文化，因此很難退一步去發現「女人是美麗的」次文化。這個過程是痛苦的，因為沒有任何一個受壓迫群體會和壓迫群體有如此親密的關係。當女人有了嵌入的經驗，會發展出和其他相似女人的親密感情連結，反思自己的性別詮釋參考架構、有機會在一個支持環境中發洩憤怒、並發展新認同的強度。漸漸地，女人就可以進入此階段後面的發散期。女人會採取比較開放的觀點，以取代過去狹隘的二元論。第四階段是整合期（synthesis）。重視做為女人的正面價值，發展正向而實際的自我概念。超脫傳統的性別角色，根據個人價值來做決策，經由個別而非刻板的基礎來評斷男人。第五階段是積極投入期（active commitment）。將新建立的性別認同轉化為為有意義且有效的行動。在個人得到滿足的同時，投入社會改革的行列，為女人建構一個更為美好的未來。作者也同時指出這五個階段並非一個單向的發展階段，女人會在這些階段中循環。當經驗到比此階段更為深刻的挑戰時，會運用前一階段習得的能力來克服。女人也可能在某一個階段停滯，特別是揭露與嵌入的階段。當女人缺乏應付當前生活壓力的能力時，也可能退回前

面的階段。而階段的進展不只決定於女人的準備程度，也受到特定人際與環境脈絡的影響。Hyde (2002) 則根據經驗研究，建議將此模式中的五個階段視為五種面向 (dimension) 而不是階段。她不斷提醒婦女研究的教師以及諮商治療師不要斷定後面的階段會比前面的階段進步或比較好。她指出許多女人即使已經到了積極投入的階段後，仍然不時經驗到對於重新喚起性別歧視的憤怒，而有些人可能沒有經過整合的階段就已經從揭露期進入積極投入期。

Stanley 與 Wise (1993) 也批評過去有關性別意識成長團體的相關研究，它們意涵了一個三階段的意識發展模型。亦即從虛假意識 (false consciousness)、意識喚醒 (consciousness-raising)，進展到女性主義意識 (feminist consciousness)。這種發展模式強調時間的序列發展，預設了階段有高低之分 (從低到高、從看不見進展至看到真實)，而階段發展似乎有終點，然後就停止了。她們認為女性主義意識不是意識改變的終點，女性主義意識也不是只有一種。傳統的階段論過於乾淨，無法描述真實複雜的意識發展過程。她們認為意識是一個循環或螺旋的過程，沒有起點也沒有終點，就只是一個永無休止的流動。Griffin (1989) 同意 Stanley 與 Wise 的看法，認為性別意識不是線性過程，而是循環或螺旋進展的。女性主義不是只有一種定義，而是有很多種女性主義，其概念的發展是一個不斷協商的過程。她進而批評傳統性別意識/認同的量化研究，指出其反映了自由主義女性主義的觀點。例如在性別認同量表中，有這樣的題目：「如果國家現在要徵兵，則男人與女人應該都要包括在內」。作為女性主義者，她們當然反對這樣的看法，她們相信女性和平運動或反帝國主義運動的女人應該也會反對的。因此如果想要用一些特質量表來區分女性主義者、非女性主義者、反女性主義者，那是很愚笨的。社會認同研究經常將研究對象看成是同質的，沒有辦法看到性別認同過程中相互連結甚而矛盾的因子，也沒有辦法看到做為女人的經驗/意義如何和其種族、階級與年齡連結的關係。

有關於性別意識的學術研究幾乎都集中在女性的經驗，極少觸及男性性別意識的發展。倒是有不少的研究者從知識論或政治行動的角度來談男人與女性主義/婦女運動的關係。男人究竟能不能成為女性主義思想的主體？許多基進女性主義者否認男人成為女性主義者的可能性。她們的論點建基在男人不可能像女人一樣地經驗世界，因此 Bart, Freeman 與 Kimball 曾說：「除非男人具有生理女性的身體，才能夠擁有成為女性主義者所需要的經驗」(引自 Schacht & Ewing, 1997, 頁 167)。然而我比較認同 Harding 的觀點。Harding (1999) 認為所有的知識都處在社會情境之中 (socially situated)，因此男人可以從男人的位置出發，對於女性主義的論述提出不同的見解。男人具有與女人不同的身體，可以進入男性更衣室，

參與軍事社會，藉助既有的女性主義理論，男人可以「思考許多我們『女性』女性主義者所無法經驗到的性別領域與問題」(頁 79, 引號為原作者所加)。Schacht 與 Ewing (1997) 也認為一位真正的男性女性主義者，可以教育並動員其他男人；進入女人所難以進入的領域裡，然後在其中推動女性主義改革；將女性主義議題放進既有的男性權力結構中；做為女性女性主義者與男人之間溝通的橋樑。

除了上述從知識論與政治行動的角度來探究男人與女性主義的關係之外，另有一些文獻討論男性團體的流派以及其與婦女運動或女性主義的關係（例如 Clatterbaugh, 1997；Goldrick-Jones, 2002），以及有少數男性性別研究者會在相關論文中談論自己的成長經驗（例如 Connell, 1987; Digby, 1998; Schacht & Ewing, 1997）。Connell (1987) 就從自身經驗出發，歸納出五點異性戀男人不會為父權防衛的理由：1. 作為壓迫系統的受益者，還是可以看得到壓迫。2. 異性戀男人和女人（包括妻子、情人、母親、姊妹、同事等）有特定關係，也希望她們有好的生活，尤其是為了子女。3. 男人之間也存在異質，可能因現有系統而受害。4. 性別關係無論如何總是不斷改變，男人不可能守著舊價值不變。5. 異性戀男人也還是有良知、感情、希望、分享的能力，就等著被喚醒（頁 xii）。

Christian (1994) 與 Cornish (1999) 是極少數直接研究男性性別意識的學者。Christian (1994) 研究「反性別歧視」男人 (anti-sexist men) 如何形成。他認為沒有性別歧視 (non-sexist) 只是一個理想，事實上不可能存在。他的研究對象包括積極參與反性別歧視運動，以及只是企圖在個人層次上和身邊的女人保有非性別歧視關係（例如願意參與家務勞動、教養小孩）的男人。經由深入訪談，他描述三十位反性別歧視男性的生命史。他發現大多數的受訪者在生活中受到下列二個因素的相互增強影響。1. 早期生命經驗當中經歷了遠離傳統性別期望的事件。2. 成人期當中受到女性主義的影響。早期生命經驗中有助於發展反性別歧視觀點的事件雖然各有不同，受訪者最常提到的有：認同承擔養育責任的父親 (nurturing father)、不與傳統父親認同、有強勢母親（特別是在支薪工作領域）、父母不複製傳統的性別家務分工、受到兄弟姊妹的影響、與女孩有良好關係、處身在性別沒有受到特別強調的兩性情境。女性主義則在他們成年期當中扮演相當重要的影響角色（尤其是受到身邊女性主義者的影響），強化了他們早期的非傳統的性別經驗。

Cornish (1999) 以非結構訪談的方法研究八位支持女性主義的男人 (profeminist men) 以及一位爭取父親應有撫養權的運動份子 (father's rights activist)，以瞭解他們如何在生命經驗中參與了性別議題的討論與活動。他發現原生家庭的價值觀以及遭受女性主義的挑戰是這些受訪者共同的經驗。如果出生在一個僵固、霸權的男性角色家庭中，當遭受女性主義或新男性角色的挑戰時，男

性要學習如何處理這個衝突。如果得到的支援（心理諮商與治療、男性團體的支持等）不足，他可能成爲反女性主義的運動者，或者只是在口頭上談談女性主義，其實心裡並不支持。如果支援充足，則能夠處理人際關係、情感自主以及建立新的非父權的社群。反過來說，如果出生在一個另類、民主、容忍度高、有批判想法的家庭中，當遭受女性主義或新男性角色的衝擊時，並不會造成性別角色的壓力，反而在人生過程中不斷學習用一種非防衛，而有建設性的方式處理張力與衝突。

西方既有的性別意識的研究集中在女性經驗，台灣的學術界也是如此，包括吳書昀（2002）以及朱嘉琦、鄔佩麗（1998）分別以婦運參與者以及三位女性主義者的生命故事來探討女性意識發展歷程；施悅欣、陸偉明（2002）以大專通識教育性別相關課程爲研究對象，檢視此類課程對於開課教師與學生性別意識的影響；林昱貞（2001）與鄭滄姣（2000）則以教室觀察與深度訪談的方法，分別研究二位（國中）女性教師性別意識發展的歷程，以及在教學現場的實踐。至於男性的性別意識形成歷程則仍然沒有人研究，與此相關的只有幾篇針對在非男性傳統領域就讀或工作的男性的研究，例如社會工作（葉明昇，1999）、護理（徐宗國，2001；楊政議，1998）、家政（李惠恩，2002）、小學教育（陳佑任，2002）。只不過他們著重的是進入此領域的抉擇、學習與工作內容，以及生涯規劃，並沒有分析個人的性別意識發展；此外，這些會進入非傳統男性領域的男生，也可能只是單純因爲個人興趣、機會受限或信仰的關係，並不一定就會有性別意識，關心性別議題，或從性別的角度進行自我反省。

台灣的婦女運動這十餘年來日益蓬勃，教育體制內近來大力推行性別平等教育、媒體也經常有關於性別的討論，此外也定期有女性影展、女作家書展、媽媽讀書會的舉辦，其實已經提供了許多接觸性別論述的機會。不過即使如此，仍然有許多人面對迎面而來的性別論述卻視而不見，或者刻意迴避，甚至將之視爲異端，不願與之對話。儘管性別論述的接觸可能是偶然的，但是願意傾聽甚至持續參與討論，通常還需要有足夠強度的動機。社會中無論是正式教育或是媒體，每天出現永遠也接收不完的訊息，這麼多的理論、看法、討論，爲什麼要特別花時間去接觸性別論述？其背後的動機何在？在一個性別歧視的社會中，爲什麼有人會跳脫社會的慣性思考，認爲男女性的角色不是「本然如此」，而是有其社會文化的成因？本研究就是企圖透過對於關心性別議題的男性的深入訪談，去探求其性別意識形成的背景以及接觸並持續參與性別論述或行動的原因與動力。



## 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目的是在於理解男性性別意識形成的過程及其脈絡條件，以及性別意識與日常生活實踐的複雜關係，所以採用深入訪談研究法，訪談具有性別意識的男性。從 1997 年開始到 2002 年期間，研究者陸續訪談了 19 位男性。受訪者係在有關性別的課堂、演講、影展或運動上尋找，或者經由性別研究者轉介。受訪者分別為五位大學生（工學院三名、醫學院一名、文學院一名）、八位碩士班研究生（分別就讀文、理、工、社會等學科）、二位博士班研究生（主修社會科學，約 40 歲）、一位文字工作者（約 30 歲）、一位工程師（約 25 歲）、一位大學教授（40 餘歲）、一位商業界人士（約 50 歲）。受訪者所參與的性別相關活動則包括：出席性別議題的演講、修習性別課程與學程、參與女性讀書會、參與婦女團體或紳仕學院、參與女性主義網站、從事性別研究、參與婦女運動或遊行、捐款給婦女團體、脫離傳統性別角色桎梏（如負責家務育兒的男性）等等。訪談內容大綱包括下列各項：1. 家庭背景。2. 教育背景。3. 性別意識形成過程。4. 身體語言、穿著、行為舉止。5. 日常行動、外出、過夜之情形；交通工具、居住空間。6. 對社會性別事件、議題之看法和參與情形。7. 是否有遭受性騷擾、性侵害之經驗，以及其對策與態度。8. 工作中之性別關係。9. 愛情與婚姻關係。10. 性別意識對日常生活之影響。平均的訪談時間大約為二小時，訪談當時皆有錄音，並轉謄成文字稿以進行資料分析。

## 研究發現與討論

女性主義不是單數（feminism）而是複數（feminisms），已經是絕大多數女性主義者的共識（如 Griffin, 1989; Stanley & Wise, 1993），同樣地，我也不預設此研究的男性受訪者會具有共同一致的分析性別現象的觀點。只要一個人能夠跳脫出生活世界的自然態度（Schutz, 1964），開始對社會中的性別現象產生質疑，不再視為理所當然，進而提出新的性別結構的詮釋，冀望經由個人或政治的行動來改善社會中的性別處境，他就有了性別意識。性別意識是一個循環或螺旋的發展過程，沒有明確的起點，也不會有終點。

根據此研究訪談資料分析發現台灣男性性別意識形成的根源，主要有三個面向，分別是：1. 傳統男性角色的束縛與壓迫，2. 女性受歧視與受壓迫的經驗，3. 重視平等價值的成長經驗。女性覺察到自己身為女性所以受到歧視與壓迫的事

實，是形成性別意識的基礎；整體而言，男人雖是性別結構中的優勢者，但個別的男人仍然可能覺察自己受到歧視與壓迫的經驗。這些經驗包括社會對於男人的期望與要求與他自己的本性不符合，或者他追隨著傳統男性角色的發展，卻又受到身邊女性她者的挑戰與質疑。當然基於男人是性別結構中的既得利益者的事實，有些男性受訪者之所以關心性別議題，起因於身邊顯著她者或是社會中的女人受到壓迫，或者身邊的女性主義者對他的親身影響。不過無論是看到自身受到壓迫，或者是為了身邊女性受到壓迫，如果沒有經過女性主義論述的洗禮，大概仍然會把此事實當成是理所當然的天生事實，或者只是個人的不幸罷了。有了論述之後，才能夠看清社會性別結構的作用。有的人從小就接受公平正義的觀念，長大之後，看到了社會中的性別問題，當然也會把性別納入追求公平正義的訴求之中。然而，有了性別的思考角度之後，男人可以得到什麼呢？是被迫要放棄自己做為男人的既得利益，還是可以解放傳統男性角色的桎梏？怎樣才可以讓個別男人在支持女性主義的路上獲得源源不絕的能量？本研究發現個別的男人是否要投身去關心性別議題，從思考進而實踐，其中牽涉了其對於：1. 男性/個人利益，2. 關係利益，3. 政治利益等三種利害關係的權衡。這裡所使用的「利益」(interest)，並非指狹隘的私利算計，而是引含興趣、關心、重要性、好處等之綜合體，比較接近利害關係的意思。

我所提出的性別意識形成模型的構成面向彼此並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影響。因為自身受到壓迫，所以更能夠同理女性受壓迫的經驗；因為有壓迫，所以尋求解放。願意投身於性別的思考與運動，一方面來自於想要去除壓迫的經驗，一方面想要追求更為理想的男女性別角色。而個人利益與政治利益之間，總是存在著張力與衝突，男人必須時時刻刻面對與應變。在這其中，女性主義論述又扮演著關鍵的角色。沒有論述的介入，壓迫的事實只是理所當然或個案；沒有經過論述的反省，可能變成關起門來的自我療傷或是與自己疏離的英雄主義。

## 傳統男性角色的束縛與壓迫

女性因為深受社會的性別歧視所迫害，在經過意識喚醒團體或論述的啟蒙後，很容易就形成性別意識。同理，男人有沒有可能意識到因為自身是男性而受到的壓迫或限制呢？這裡我將男人所可能意識到的傳統男性角色的束縛與壓迫分成四種類型。一種是質疑傳統的男性氣概，因為與個人特質興趣不符。反過來另一種是遵循傳統男性角色的發展，但是卻遭到質疑與挑戰。另外二種人則是因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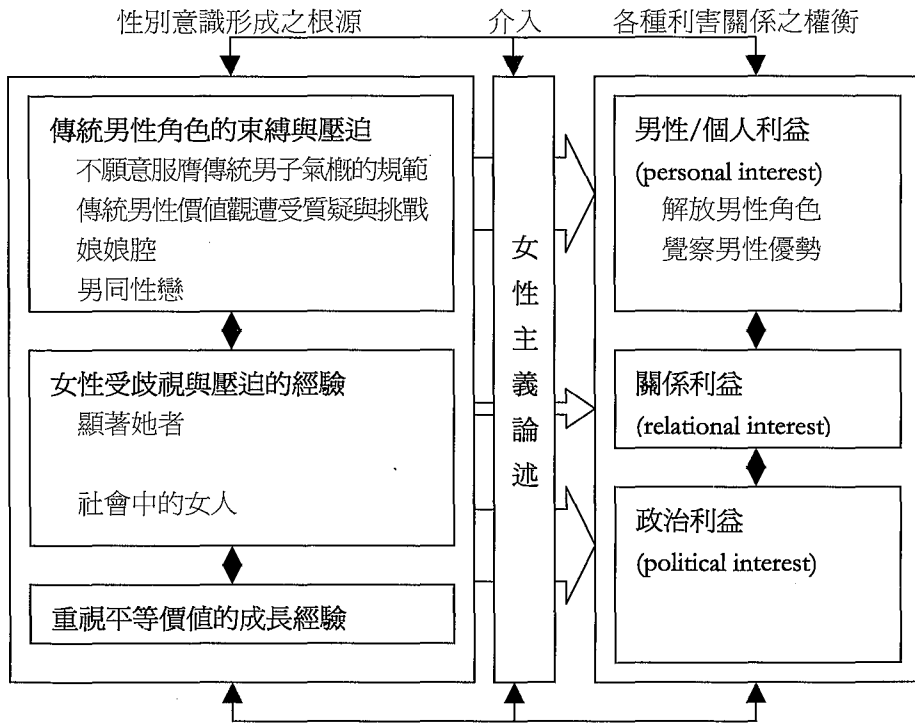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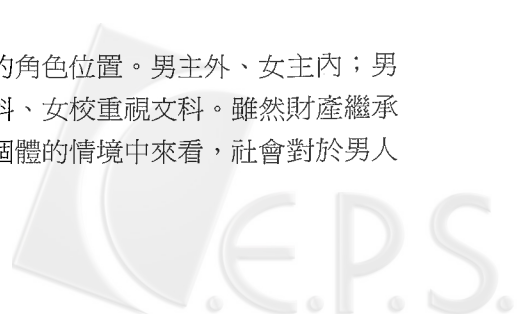


圖 1 男性性別意識之構成面向

不具有傳統男性氣概而受到社會的歧視與壓迫，分別是娘娘腔與男同性戀者。這幾種人都在主觀經驗上察覺父權體制對自身發展的限制，但是影響程度不一。第一種人，要不是努力與周遭環境抗爭以追求自己喜愛的發展方向，要不就是放棄自己的堅持，順著傳統的路子走。然而即使違反自己的意志，他仍然可能保有男性在性別體制中的既得利益。第二種人在服膺社會性別要求下成長，本身並沒有對傳統男性價值觀產生懷疑，然而在與親密關係互動下，自己的男性價值觀反而遭受挑戰。男同性戀者或者隱藏身份，過著雙重生活；一旦現身就要面臨人際與體制的歧視與壓迫。至於娘娘腔則因為其性別特質不符合社會對男人的期待與要求，而且無法隱藏，因此被迫要在一個辛苦的環境中成長。

### 1. 不願意服膺傳統男子氣概的規範

傳統的性別結構分別安排男性與女性不同的角色位置。男主外、女主內；男人要養家活口、女人要照顧家庭；男校重視理科、女校重視文科。雖然財產繼承以及工作職場制度等都對男人有利，但是放入個體的情境中來看，社會對於男人



的角色期待，不見得會符合其自由意志。許多家庭以及學校仍然持有重男輕女的觀念，對於女性的未來比較不抱有期待，然而對於男性的過度期待卻可能造成壓力。男人有養家活口、傳宗接代與光耀門楣的重責大任，這種來自於父母甚或家族的期待，可能讓男人無法按照自己所喜歡的方式來生活。要不要結婚、生子，選擇什麼科系與職業，就不能只顧慮自己的喜好，而要顧及家人/家族的意見。在家身為長子的 K 以及身為工程師的 R 分別說：

我家放了很多期待在我身上，那我小時候的壓力非常大。...我很反叛，不惜跟家裡翻臉。我升高一時，我決定念社會組，我爸就跟我翻臉翻了一個月。...[後來]我比較能卸除壓力，這是長期抗爭的結果。我家人必須壓抑他的慾望，或是學習不要在我身上放太多期望。這好像不是性別的問題！可是好像也是啊！如果我不是男生，就不會。(K)

我也不願意被社會定義成說男生一定要是怎麼樣，或是我應該扮演怎樣的角，我想要的只是讓我自己擁有很多的技能，並不想趕快加薪，趕快升職，我只想做我有興趣的事情。但是老闆會一直不停的誘惑你，告訴你要怎樣定位你自己，父母親也壓迫我一定要結婚啊！(R)

R 擔任工程師只是因為其中有許多知識上的樂趣，並不是想找一家好的公司賺很多的錢。但是老闆就會一直誘惑他，勸告他男人應該要為未來的家庭著想。他的父母親也不斷提醒他「立業成家」的重要性。然而 R 關切的是要「過自己的生活」，因此和社會對於男人的期待有所出入。

這種壓力在與家庭中姊妹的經驗對照之後，會更為明顯。「我父母認為我姊妹怎麼樣沒有關係，反正以後嫁人當媽媽。我是第一個他們有事業期待的小孩。」(J) 父母對於到達適婚年齡的女兒有可能也會逼婚，但是男人不只有結婚的壓力，還有擔負子孫延續的責任。女性也許羨慕兄弟能夠得到父母的支持與鼓勵，但是男性卻可能羨慕父母對於姊妹的放任，反而感受到由於身為男性的身不由己。「尤其是我是長孫，在家裡又是獨子，那種應該要怎樣的話，從小聽很多，可是事實上我不想那樣做。」(J)

如果沒有女性主義論述的幫忙，當單一男人意識到做為男性所受到的限制甚至壓迫時，有可能反而認為女人比較輕鬆，沒有就業婚姻的壓力，或者認為女人可憐男人也可憐所以扯平，因而看不到社會中存在性別歧視的結構性問題，也無

法意識到男女所共同面對的父權體制。其實一個男人即使在工作或婚姻選擇上受到家族的壓力，但是他同時仍然享受著做為男性的優勢。他可能在學校得到老師較多的注意力與重視、在家裡不必做家事、夜間行走於公共空間不會懼怕遭受陌生女性的性騷擾、不會因為結婚就必須放棄自己的工作，然而他不一定會「意識」到自己做為男性所享受的「優勢」。即使觀察到自己與姊妹或女性同儕的經驗不同，也傾向於用非性別的原因來解釋。例如因為我比較聰明認真努力所以得到老闆的賞識、因為我年紀比較小所以不必做家事、因為我功課比較好所以父母願意投資較多的錢在自己身上。這樣的解釋讓他看不見性別結構的不平等。如果自己可以出門可以晚歸，而姊妹不行；姊妹比較容易意識到性別不平等，可是男性可能已經接受社會的性別價值觀，覺得本來就應如此而理所當然。意識到遭受限制與壓迫容易，但是要意識到自己的既得利益則顯然困難許多。必須要受到女性主義論述的衝擊，以及有深刻自我反省能力的男人，才有辦法做到這一層意識的覺醒。

除了傳統男性氣概對於男人工作與生涯規劃的期待有可能與個人的志趣不符之外，只要不參與在異性戀男性氣概建構的文化當中，例如不喜歡談論女人的身材、不喜歡運動、不喜歡應酬，就可能受到男性同儕異樣的眼光。擔任工程師的 R 因為不抽菸不喝酒，因而會影響他得到男性同儕的認同。他的同事們，在上班過程中，經常會中途休息，一群人一起到外面「抽菸打屁」。他很討厭抽菸，可是如果不參與，就顯得格格不入，而且會錯失許多關於工作的小道消息。於是他也跟著同事一起聊天，別人抽菸他就喝咖啡。同事可以菸一根接著一根抽，他咖啡喝多了卻很痛苦。「他們在互相借菸，在互相幫對方點菸，互相饋贈、接受...談哥兒們間的話題。...如果我什麼都不做，就會在男生的團體裡面有生存的困難。...你要去應酬社會應對，你不參與，你就是異類。」R 說他也追求獨立，但「不能因為說我是男人，所以我應該要獨立」；他反對社會加諸男人的刻板角色桎梏。然而 R 沒有說的是，在這種男性應酬文化之下，女人更是處於邊緣的弱勢位置。

## 2. 傳統男性價值觀遭受質疑與挑戰

受訪者 N 遵循傳統男性角色的路途前進，娶妻生子、事業有成。太太結婚之後就在家中擔負家務勞動與育兒的責任，先生認為辛苦工作就是為了支持這個家庭。他認為自己做的蠻成功的。然而太太的改變迫使他不得不調整自己的想法與作法來與太太互動。太太不再願意待在家裡成為全職的家庭主婦，企圖尋找自己的空間與時間，因此開始走出家庭，參加課程、參與社區的工作。

有一陣子我太太參加成長課程，甚至在做社區發展的工作，那個時候我都還沒有成長，摩擦就越來越大。因為她出去的時間越來越多，

經常中午不回來煮飯，或者偶而回來買個便當就走了。我們經常會摩擦、吵架，那我爸爸也很不能接受，我爸爸不好意思當面跟她講，就跟我講，跟我講我就發洩到她身上去，有一陣子我是覺得嚴重到幾乎差不多將近要破裂的邊緣了。

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裡，太太幫他報名男性成長課程，他抱著姑且去看看的心態參加，結果聽了教授講授關於家庭婚姻、親子關係的課程，和生活層面非常接近，內心開始受到一些影響。以前下班以後覺得去交際應酬都是理所當然，或者回到家裡，反正男主外女主內，一回家就什麼都不管，只會翹著二郎腿讀報紙看電視。然而因為要上課，他破除每晚要交際應酬的習慣，下了課「回去跟太太孩子分享的時候，覺得蠻受用的，慢慢的整個家庭的氣氛就改變了。...那事實上跟太太的話題也多了，因為我們其實從課程當中已經挑出很多夫妻共同的話題出來。」

更重要的其實是他慢慢地學習如何從女性主體的角度來看事情，而不是用男人自以為是的觀點。他以失業做為例子。

當先生失業，可能感受上這個家庭好像要支撐不住了，好像要面臨大危險了。那同樣的，太太失業的時候，我們就沒有這種感覺。可是太太失業跟先生的失業，本身的感覺應該是一樣的，因為雙方本來就投入很多，失業可能打擊都一樣很大。...可是太太一失業的時候，先生覺得反正我還在賺錢嘛，也大不了你在家裡待著就好了嘛，我們只能這樣感受。可是就太太來講，她一個職業能力，她的一個活動空間，可能會改變她的生活狀態，她的感受我們沒辦法全部了解到。...我覺得我們真的沒有辦法從女性的角度來思考同樣失業的問題。

經過多次男性成長課程的參與討論以及與家人的溝通，他慢慢揚棄過去男性單方面的價值標準，學習如何去體會女性的主體經驗。

我覺得他觀點的轉換（shift）是一個非常寶貴的經驗。過去男人習於用男人本位的角度來思考、對待女人。一方面會覺得給女人一個安穩的家，女人還有什麼不滿可以抱怨的；一方面男人自以為是善意的行為並不見得能夠符合女人的需求。如果男人沒有多傾聽女人的經驗與心聲，則往往會因為自己的善意或關愛得不到認可而感到沮喪或憤怒。Seidler（1994）也指出男人對於親密關係往往不採取主動，同時又拒絕承認自己的需求，認為沒有需求是堅強的象徵，然而這樣可能建立一個虛假而不平等的關係。男人如果總是站在提供或取悅女性伴侶的位

置，而不是學會與伴侶協商，那麼就很難以瞭解她個人真正需要的是什麼。

### 3. 不具傳統男性氣概的男人：娘娘腔的男人

Mac an Ghail (1994) 指出異性戀男性主體性建構的三個主要文化元素：1. 強迫性異性戀機制 (compulsory heterosexuality)，2. 厭惡女人 (misogyny)，3. 同性戀恐懼症 (homophobia)。它透過「性別邊界維持」以及「對於男異性戀認同的監督與正當化」來達成，因此男異性戀者必定牽涉雙重的關係，1. 對外的關係：詆毀女人與同性戀者；2. 對內的關係：去除內在女性氣質與對於同性的慾望 (頁 90)。從他的觀點加以引伸，也就是說歧視女性、歧視娘娘腔、歧視同性戀都是建構傳統男子氣概的機制，也都是貶抑女性氣質的表現。所以娘娘腔與男同性戀比較容易因為受到歧視與壓迫的切身經驗，一方面體會女性的生命處境，一方面意識到異性戀父權的存在。

相對於女性氣質，社會賦予男子氣概較高的評價與名聲，所以當一個男孩表現的像個娘娘腔 (sissy) 的時候，就成為對男性角色的背叛。社會對於娘娘腔的厭惡，是因為他太像「女人」，而不是針對他所擁有的氣質本身。在一個男性主宰的社會中，男人在上女人在下，如果一個男人甘於放棄上帝賦予的優勢地位，受到歧視似乎理所當然 (Bergling, 2001)。歧視娘娘腔是一種貶抑女人的展現，如果討論娘娘腔而不提及厭惡女人 (misogyny)，那就會掌握不到重點 (Bergling, 2001)。

受訪者 H 娓娓道來他成長的故事。

H: 你是個男生可是看起來不像男生，太纖細或是太娘娘腔，就有人會去辱罵你、對你講髒話、攻擊你。譬如說你去上課的時候，就有人打你一下，而且很用力這樣打，他打了就跑了。我覺得莫名其妙，你要追他，又跑不過人家。

畢：這些事你都還記得？

H: 太記得了，一幕一幕就這樣被人家打。

他接著說，有一次國文老師要他起來唸課文，唸完以後，老師不是說他唸錯了，而是「聲音不對。...當著全班那麼多人的面前那樣講，全班就在笑。...真是情何以堪。」大一的時候，他參加新生盃辯論比賽，「就一直打，打到最後一場冠亞軍。領隊是一個學長，他就長得很堂皇，他說你的聲音怎樣怎樣，把你換掉。他覺得找個聲音比較有攻擊力的來取代我。」這種事情一再出現於他的生活當中，似乎因為男生具有女性氣質，他的能力就受到質疑。他不斷思考自己究竟哪裡跟

人家不一樣，為什麼別人要說他娘娘腔，要欺負他，「這是讓我很容易接受女性主義的一個原因，讓我對於許多女性的處境能夠感同身受。」家裡的事情他談的不多，因為那是他另一個難以碰觸的傷痛。他不只是因為像女生而在學校遭受欺負，家其實對他更是一個傷心地。家中有一個非常嚴厲，甚至暴力的父親。他們家的小孩經常無緣無故被打，媽媽其實也是父親暴力的受害者，所以也幫不上忙，只能在旁邊安慰小孩：「給他打完就沒事了」。他經常放學不敢回家；吃飯的時候，儘量吃快一點好離開飯桌；大學聯考填選志願，也刻意選擇離家比較遠的學校。大學的時候，遇見幾個女性主義者的朋友，他說：「接受女性主義的東西好像蠻自然的，沒有什麼震撼...沒有什麼抗拒那種感覺」。從小在暴力威脅籠罩之下成長的 H，對於弱勢處境特別敏感，也厭惡各種壓迫與暴力。接觸女性主義之後，就很自然的從性別的角度來思考社會現象。

另外一位受訪者 E 小時候也是因為「像女生」而受到同學欺負。他在讀幼稚園以前，頭髮留得長長的，很像女生。由於父親是工人，有一天他學大人講髒話，沒想到大人好高興，覺得終於鬆了一口氣。讀小學以後，也許是因為說話太小聲、害羞的不敢上台說話、手裡還經常拿著手帕、又很愛哭，因此班上的同學覺得他太像女生。又因為男同學喜歡球類運動、喜歡捉弄女生，而他並不喜歡，所以他比較常跟女同學玩，像是一起玩紙娃娃。在台灣社會裡，如果課業表現優秀，老師會稱讚，同學就比較不敢欺負你。很不幸的是，國中的時候他讀的是 A 段班，每個人都很優秀，所以他的性別特質就會特別突出，同學還幫他取一個綽號，叫做「小龍女」。

更莫名其妙的是，有一次班會討論班務，突然間不知道怎麼回事，討論的主題居然變成：×××為什麼那麼像女生？那麼娘娘腔？我竟然成為班上公共討論的話題。班上男生覺得我太女性化，女生也覺得我不夠男生。當時我還沒有受到女性主義的啟蒙，根本無力為自己辯護，只是覺得很沮喪，好像手術台上受人支解的羊，但是我始終不認為我有什麼錯。

就讀大學時，為了編輯系刊，修了「女性主義思潮」這門課，被同班男同學譏為「男人的叛徒」，女同學對他也多半不敢苟同。在這門女性主義課的班上，選修的男生可說鳳毛麟角，在一個全女人的國度，男生頓成弱勢族群。「不過我並不因此而感到自己受到忽略...反倒是被[任課老師]另類的性別思考方式所吸引。例如她說，公婆不是自己的父母。」課堂所學印證了他自己日常生活的性別經驗，

又有機會聆聽女同學述說女人的生命經驗，讓他從此一頭栽進女性主義的國度。結果呢，正是因為他恰好是不符合傳統男性角色與期待的男人，所以反而從女性主義找到了支持生命的力量與能量，使他有自信與能力做自己。

總結而言，娘娘腔可以形成性別意識的原因有：1. 娘娘腔因為其性別特質不符合社會性別規範而受到社會的歧視與壓迫。2. 娘娘腔恐懼症的根源其實和憎惡女人分不開。3. 娘娘腔經常與女性一起遊戲、相處，一方面有比較多傾聽女性經驗的機會，一方面也有較多接觸女性主義的機會，進而與女性結盟。4. 女性主義論述對於傳統男女刻板角色界線的批判，有助於去除娘娘腔的污名。

#### 4. 違反異性戀男性氣概的男人：男同性戀者

同性戀者在我們這個為異性戀體制所主宰的社會中，生活受盡歧視與不平等對待。它展現在各個不同的生活領域中，包括法令（同性伴侶沒有結婚權，因此也就無法享有婚姻所帶來的各種權利）、工作（同性戀身份一旦曝光，可能面臨不友善的工作氛圍、甚至遭致解聘）、教育（現行教育課程中極少傳播較為正確的同性戀資訊，同性戀學生還有可能受到強迫去接受心理輔導）、空間（同性之間不能在街道上牽手擁抱，即使在家中還要將情書與同性戀書籍藏起來以免家人發現）。由於社會的歧視，導致同性戀者為了維護自身的安全，必須製造謊言，過著雙重生活。不能和家人朋友分享自己的生活，而懼怕身份曝光必須高度警戒，這種壓力讓人無法放鬆，且損及個人自我的完整性（Pharr, 1988）。「那種被壓抑的感覺，我想會有助於我去同理女性在平等下的感覺。」（F）「因為我自己是從同志的角色走過來，所以我會比較注意到不公平、壓抑的事。接觸女性主義之後，比較知道那個來源。」（A）

受訪者 D 在訪談過程中提及女性主義對他個人的意義時，曾經表示：「女性所碰到的，除了身體以外，其他她們能反應到的，我都能反應到。所以我覺得也蠻切身的。」訪談最後他主動告訴我他是同志，然後他就表示訪談可以結束了，因為謎底已經揭曉。對他而言，他關心性別議題的理由似乎不言而喻，不需要再多加解釋了。他認為除了身體不同之外，女性所會碰到的處境，他也都能親身體會。布魯斯（2002）也以親身經驗說明接觸女性主義論述之後，讓他體認到同性戀和女性其實是一個生命共同體。他在大三那一年無意間修了一門「女性文學專題研究」的課程。「修課之後，我發現從小到大的自身處境竟然跟傳統女性沒什麼兩樣。那是第一次跳脫出傳統性別概念，與原本不相干的人有了『生命共同體』的感受。」（頁 214，引號為原作者所加）

女性主義為同性戀污名提出解釋，而男同性戀的受壓迫經驗讓他們容易同理女性的受壓迫經驗。台灣婦女運動的努力與成果，也可以成為同性戀運動的借鏡。

受訪者 F 表示在他想要做一個同性戀運動家的時候，就開始關心女性主義。「我覺得女性從一個很負面、弱勢的情況底下，到現在這個社會至少她們有很多的聲音存在，她們經過從一個弱勢，跟一個主流、強勢、中心去吵、去爭、去討論，這是一個非常值得我去做為借鏡的東西。」知道婦女運動是怎麼走過來的，比較知道同性戀運動應該要怎麼推動。

此外，由於男同性戀對於女性並沒有情慾關係，反而比較容易建立起平等的朋友關係，女性也比較不會有遭受性騷擾的恐懼。這種情況下，他們更可以分享彼此的經驗。而同性戀之間的親密關係並無主流固定的相處腳本做為範本，比較可能擺脫異性戀之間的男尊女卑、男強女弱、男主動女被動的相處模式，因此女性主義論述並不會危害自己在親密關係中的優勢位置。更進一步的，「女性主義的好處在於，不僅是女性，感覺上不會隨便去歧視別人。」(A) 事實上女性主義所批評的傳統性別角色的邊界，也正是男同性戀的壓迫所在。另外，如果男同性戀不願意出櫃現身，婦女團體與運動則提供了一個安全的環境讓他們表達自己。女性主義思想對於男性運動很重要，然而同性戀運動並沒有清楚擁抱女性主義。對於那些必須在意適當性別角色以免現身而遭人歧視的男同性戀而言，他們與女性主義者的連結可能還超過與男同性戀的連結。

## 女性受歧視與壓迫的經驗

群體相對被剝奪感是形成群體意識的基礎，因此意識到女性做為一個群體受到父權體制不公平的待遇，導致女性發展性別意識。男性作為社會中相對優勢的性別群體，除了如上述受訪者所經驗到的為傳統男性氣概所限制與束縛之外，有些男性是因為發現了社會中或是身旁女性受到歧視與壓迫的經驗，才讓他們開始反思性別的問題。女性的受害經驗，有可能只是社會中存在的一個現象，也有可能很切身地就發生在自己的生活世界之中，也有可能身旁女性的受害處境與自己做為男性而擁有特權是分不開的。受訪者因此也會有不同面向與程度的反省。

1994 年初鄧如雯殺夫案引起輿論的關切，受訪者 K 當時正在立法院擔任助理，並且在電台主持節目。為了回應社會現象，他安排了三集節目請相關的專業人士來座談，自己也開始接觸性別論述。「發現我必須要去唸一些東西，我也覺得慢慢地自己有被教育到。我開始會把這個問題放在整個社會結構裡面去看它，就不會單純地認為那是單一的事件。我想那是開始吧！」一個衝擊人心的性別社會案件，加上他的閱讀與討論經驗，他逐漸意識到了殺夫案可能不是一個特殊獨立案件，而與社會性別結構系統有關。



受訪者 A 到誠品書店看女性影展，影片放映完後還有座談。座談人從子宮外孕的檢查當作引子，談到醫療系統對女生是多麼的不體貼。由於他是醫學院的學生，對於這席談話就特別有所感。此後他又繼續研讀女性主義的書籍，對於醫療體系中的性別不平等有更為深刻的認識。他也在求學經驗中，看到醫師態度的不友善，「婦產科中醫生在看女性產婦一指二指的時候，後面就是一票學生，包括女生與男生，不尊重產婦的隱私權。」

有的受訪者則是目睹性（別）暴力就在家中上演。「我父母的婚姻關係不是很好，我小時候就看到婚姻暴力，書上或期刊上講的我覺得一點都不奇怪，因為不會是少數，就發生在自己的家裡。」（H）一方面他可能希望改善或解救母親的處境，另一方面在他性別認同的發展過程中，父親就無法成為學習的典範，甚至反而成為負面教材。Christian（1994）的研究發現一個充滿關愛的父親（nurturing father）角色模範對於男人形成反性別歧視價值觀的重要性。然而本研究沒有受訪者特別提到值得學習的父親典範，反倒是父親的負面形象給予受訪者參與女性主義極大的動力，因為女性主義所批判的典型傳統大男人的極致就在自己家中上演，並且帶給自己或其他家人很大的傷害。E 的父親從小出門在外工作，長期不在家，家中大小事情都是母親一手承擔，他和父親的關係非常淡薄。H 的父親是個施暴者，他從小就想逃跑。W 不願意說出他父親做了什麼，使得他的母親在他五歲的時候就逃離家庭；W 說他父親在世的時候，他過得都很不快樂。對於他們而言，女性受父權壓迫的經驗，自己不只是感同身受，甚且就深受父權所害；女性主義論述為自己的不幸經驗提出解釋，並許諾了一個不一樣的未來；而父子之間的疏離或怨恨的情感，給他們強而有力的能源去參與婦女運動，共同打擊父權（者）。W 就曾說：「我有多恨男人，就有多愛女人」。

在受訪者描述社會或身旁女性遭受不平等待遇的經驗時，我發現似乎至少有二種經驗可以幫助男人看見。一種是兒時成長過程中，有非傳統性別經驗；另一種則是曾經經歷其他類型的受欺負或受害經驗。例如 W 因為從小父母離異，父親帶著五個小孩，辛苦謀生之餘，沒有餘力從事家務。於是他們家的男孩子也都要從事家務甚至外出買菜，「這種普遍和全面深刻的參與家庭分工的過程裡面，我在很小的時候就體認到了作女人，或是扮演女人這樣一個角色是非常辛苦的。」而他在就讀小學的時候，因為是班上唯一的外省人，結果「除了言語上被嘲諷、被孤立之外，我也會被修理的，就是 physically 的被修理。」諷刺的是，高中的時候就讀一所外省人的學校，班上只有一個台灣人。於是他又看到這個台灣人被同學嘲諷、孤立、取笑的經驗。有了這壓迫與被壓迫的雙重經驗，讓他對於強勢/弱勢、多數/少數有了更為深刻的體驗。

## 重視平等價值的成長經驗

如果男人是性別體制中的壓迫者，並沒有集體受害的事實，那男人如何可能發展出性別意識？公平正義與道德訴求，也許可以是男人參與性別運動的理由。bell hooks 曾指出一個人不一定要有受害經驗才會對宰制結構反叛，經由道德與政治理解也可以讓人拒斥宰制（引自 Pease, 2002），而採取了道德原則之後，一個男人關心的就不只是他的女性伴侶，而且包括社會一般的女人。

K 就認為他所相信的平等價值，讓他無法迴避性別的問題。「我會對性別議題做思考，是慢慢地從學運的經驗裡出來的。...我心裡有一種平等的價值。」然而在他參與社會運動的經驗當中，發現勞工、政治、環境運動很容易取得正當性，爭取到的資源也比較多；性別影響的層面、人數最多，但是獲得力量卻最小。等他到立法院工作的時候，又陸續碰到性別相關議題，參與社會運動所相信的平等價值，讓他無法再用「天生就是如此」、「社會本來就這樣」之類的看法。這樣的看法是有問題的，會和他所篤信的價值產生衝突。

S 從小因為不會打電動、不會騎腳踏車、父母規定放學就要馬上回家，所以沒有什麼機會和班上同學互動。甚至在小學三年級時因為在家門口騎三輪車被同學看到，就成為同學嘲笑的對象。「大概因為總覺得自己是邊緣，所以很重視公平。我覺得這是一個開端。不能容忍不公義的事情存在，有時候簡直有點憤世嫉俗。」因為很注重公平，所以他就很討厭老師的孩子。「因為他們常常有些特權，明明沒有什麼本領，卻常常得獎。我就很厭惡這種事情，常常因此反彈。」他表示：「老實說，以前讀性別是帶著悲壯的英雄主義，要替弱勢代言，打抱不平。」他記得在上性別課程的時候，老師也會問修課的男生為什麼要支持女性主義，同學的答案也不外乎是「為了平等啦、本來就是對的當然要堅持啦、沒有理由反對啦」。

Cornish (1999) 的研究發現，出生在一個另類、民主、容忍度高、有批判想法的家庭中，是男人支持女性主義的關鍵因素。我認為他的發現，某種程度反映出美加在六零年代受到各種社會運動（婦女運動、同性戀運動、人權運動、環保運動、嘻皮運動）的衝擊，徹底地影響了他們的家庭、性別、養育子女的價值觀。台灣於 1987 年解嚴，婦女運動也是在解嚴之後才比較蓬勃地發展，因而比較少受訪者舉出民主或非傳統性別角色實踐的家庭成長背景對他們的影響。

## 女性主義論述

小時候很喜歡玩籃球，但是我幾乎看不到女生去玩籃球。有時候

女生會去玩，然後就會被男生笑，說你們這麼矮啊，投不到，或怎麼樣。整個講起來喔，我現在當然會很確定知道是性別，可是那個時候我並不是很清楚是，但是我模模糊糊的知道，就是說，作女生是倒楣的，說的很簡單就是這麼一句話。那倒楣的地方就是她要做家事啊，她不能跟男生一起玩啊，甚至她不能爬樹或講髒話啊，她必須穿裙子啊等等，那這種東西呢，我覺得有一部份是跟性別扯在一起，只是那個時候我沒有辦法把它說出來而已。( W )

有受到社會性別歧視的主體經驗，或是看到他人受到性別歧視，並不一定會發展出性別意識。他只會把社會的性別現象視為理所當然的存在或者認為男生/女生天生如此，而沒有從社會文化建構的角度來認識與分析，也沒有看到改變現象的可能性。正如以上所述，W 清楚看到男生與女生待遇的大不同，但是在沒有經過女性主義論述的詮釋之前，他所能夠體會到的只不過是「女生就是很倒楣」罷了。性別意識很難是一個人關在房間裡經由不斷內省就可能獲得，而經常要受到論述的啟發與影響。我所說的論述指涉較廣，不一定要閱讀女性主義書籍，它也可能是一場演講、一部電影，或者是受到身旁女性主義者在互動過程中的影響。Klatch (2001) 指出女性主義意識的第一個階段是認識到女人受到不當的待遇，而第二個階段牽涉到不同「視框」(framing) 的引用。她借用 Goffman 的概念，說明視框可以讓個人對於生活空間中的事件加以指認與命名。它是一種詮釋架構，將早期女人認為是不幸運或是可以忍受的不公義、不符道德的處境重新加以定義。結合了對於社會問題的診斷以及改變社會的策略，意識到問題是政治的而不是個人的，是情境的不是個別的。

受訪者 Z 小時候學畫畫，對於老師蒐藏的人體素描範本特別的好奇，對裡面男女模特兒表現方式的差異留下深刻的印象。就是畫中的女性往往裸著身體、眼睛看著畫外的觀畫人，而男性模特兒則或衣著整齊或眼睛看著遠方。他當時也不知道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差異，等到接觸女性主義之後，才知道這叫做男人的凝視。正如 J 所言，跟著學姊在讀書會研讀女性主義書籍之後，「發現原來我以前的那些疑惑，結果是真的存在的」、「就一樣一樣好像開了自己的眼睛」。女性主義論述可以讓人對於過去所經驗到的性別處境提出新的詮釋，而一個人由於獲得女性主義論述能力，也會因此對於社會性別現象較為敏感，過去視而不見擦身而過的性別現象都會一一在其面前展現。另外一個副作用是，當他身邊的人知道他具有性別概念的時候，也會比較主動願意與他分享自己的性別經驗。

達努巴克 (2002) 身為原住民，從小遭受種族歧視，他因此非常深刻感受到

社會中存在的 unfair，然而擔心性取向遭受質疑，他始終不敢面對性別問題。葉永鋕過世之後，身為高樹國中的老師，他一直活在罪惡感當中，認為如果當初做好性別平等教育，也許事情就不會發生。因為葉永鋕事件，他認識了許多從事性別平等教育與運動的朋友，因而邂逅女性主義。女性主義論述讓他學到了批判精神，重新審視自己做為原住民與娘娘腔的成長經驗，他找到了與部落對話的可能性，也將性別意識融入他的課堂教學當中。面對社會中的性別歧視，他想到從小不跟男孩同一國，只有跟女生在一起，才覺得安全，不會擔心有人欺負他，因此覺得「她們曾經站在我這邊，我也應當站在她們那邊。」(頁 154) 而遭受種族歧視的經驗，在對照性別歧視之後，他體認到「要求別人對自己公平，那我們對別人公平了嗎？」(頁 155)

K 則說以前在父權體制下生活，佔盡了好處還自鳴得意，但是接觸女性主義之後，他有了全新的看法。

剛好和我交往的女朋友都很會做菜，我就很 enjoy 被她們伺候、吃她們煮的菜。我覺得你可以把它詮釋成一種幸福！我那時候怎麼想呢？那時我覺得那是因為她們比我會做，而不是我不願意。有一個條件讓我懶散，我自己不用去處理；而且我知道如果我偷懶一下，那個東西我就不去做，也會被完成。我也覺得在那樣的關係裡是危險的，因為到後來就發現，我不太知道怎麼去煮、處理那些東西。我覺得那是一個能力的殘缺。

如何接觸到女性主義論述，每個人會持有不同的理由與機緣。身邊的女性具有女性主義意識是一項蠻經常聽到的理由。Z 是上大學以後遇見一個女生，才真正開始討論與反省有關性別的事情。

記得有一位男老師教英文單字的背法，每一個單字為了教我們怎麼記憶，都會用故事的方式。例如 morose 就說女人因為沒有人送玫瑰花給她所以悲傷，很多單字背法的故事都是那位女生聽起來會不太舒服的話。幾年後我到補習班旁聽，居然又聽到一樣的笑話背法。所以往後其他老師上課的時候，這位女生就會告訴我，老師剛才又說了跟性別有關的笑話了。而我好奇地問她：妳為何如此地敏感於這些話語中傳達的意涵，而且我也想要更深入地認識她，想知道她的體驗。於是她告訴我她的一些關於性別意識的經驗、修過的課程、相關議題等

等，我才開始覺得這是一件不時地存在且值得細細思考的議題。我了解到了許多經驗上的差異，男生聽到也許覺得很正常的話，但是女生可能會反感。慢慢地開始聯想很多關於性別的事情。

J 因為宗教信仰的關係，參加大學校園裡的團契，而團契裡剛好有一個兩性讀書小組，因而開啓他研讀女性主義之途。而大一英文的任課女教授，也會刻意把環保、性別、人權等議題加入授課內容，讓他感受到很大的震撼。

B 選修性別學程的原因很另類，他的動力來源有一部份是很「男性思維」的，因為他「對女性主義也懷有一點點敵意」，有點想要證明「妳們這些偏激的女性主義者是錯的！」在有系統地研讀女性主義之後，他更清楚可以分辨「裡面有我不喜歡的論述、不喜歡的人」，然而他也為女性主義所說服，連「說話的方式都改變了」。他認為有些女性主義者依舊排斥邊緣（如某些性偏好），覺得自己在某些議題上也許比她們更接近女性主義的核心。

當然也有人為了要在學術界裡生存、能夠與同儕對話，因此必須對於當前的重要論述有起碼的瞭解。所以他可能讀新馬克斯主義、心理分析、後現代主義，也讀一些女性主義論述。然而除非他認為女性主義相對於其他論述，給了他知識上更大的啓發，或者能夠把女性主義連結到其個人親身的經歷上做一較為深刻的反省，否則把女性主義當作是諸多知識當中的一種而已，就比較難對此論述投入，也許有新的思想興起，他又追隨新的潮流去了。

這一小節除了討論受訪者如何接觸女性主義，以及女性主義論述如何影響受訪者對於性別現象的詮釋之外，也希望指出：男人身邊的女性顯著她者（如女朋友或太太）是女性主義者時，對他們產生影響，讓他們不得不認真面對女性主義論述與實踐。例如 N 提到太太不願意擔任純粹家庭主婦的角色，而走出家庭追尋自己的時間與空間。婚姻的危機逼得他不得不重新看待自己做為先生與父親的角色。K 則談到其女朋友對他產生的影響。

事實上在性別問題上，她比我能打破傳統的一些問題，所以我在這過程中，我被挑戰了很多部份。譬如說，有一次她說結婚以後應該要分床睡。我就想，那很奇怪！怎麼會有這樣的想法？我後來發現說我覺得沒有道理的原因，不過是社會中大部分的人都是這樣子。像這樣的小地方，我不斷被挑戰到。在我的理智上，會留下痕跡。有時候我會把它拿出來檢視一番，在理智上我可以接受。

他進一步解釋，「也許當初的讓步，是為了維繫關係，是基於非理性的考慮，可是事後我覺得那在理智上是有道理的。」Christian (1994) 發現很多反性別歧視的男人都在成年期受到身邊女性主義者的影響；而 Cornish (1999) 則指出支持女性主義的男人幾乎都經歷過女性主義或新男性角色的衝擊。台灣如果在教學與媒體中有更多而強的女性主義論述，並且有更多女性主義者出現的話，面對這樣的衝擊，相信會有更多男人不得不思考自身男性的角色而有所改變。

認識女性主義論述或者說有了性別意識之後，會對作為一個男人產生怎樣的衝擊呢？是自我價值的提升、活得更自由，還是失去了男性特權？又是怎樣的力量，可以讓男人繼續關心性別的議題，甚而在日常生活中具體實踐？這牽涉個人的政治 (politics)，其對於性別的反省與實踐決定於他對於個人、關係與政治利害關係的權衡。每個男人對於不同利害關係所放的權重不同，而不同的利害關係之間也會有所相互增強或衝突。

## 男性/個人利益

J 在大一的時候接觸了女性主義論述，發現讀書的內容對他來講都非常切身。那個時候他並不是以悲天憫人或憂國憂民的心態去為另外一個性別著想，比較是以他自己的觀點在看、在替自己想。

我為什麼在傳統下男生就是被形塑成這樣子？我幹嘛沒事就一定需要有車，我為什麼一定要裝出一副很男子氣概的樣子，就是要這樣子什麼領導一切、要有氣勢...，我覺得沒有必要，我從小就覺得說我不想那樣子。可是一直有那種壓力，可是外面的聲音就是說你一定要設法讓自己變成那樣子，我覺得自己也很痛苦。

接觸女性主義之後，可以解釋性別刻板角色產生的背後根源，也可以減輕自己的負擔。所以一方面可以因此從自身的經驗去同情的理解女性所受到性別結構的束縛，另一方面讓自己從刻板角色中解放。這裡面當然也有自利的成分，「因為身為男性是可以 shift 的，你既然佔有身為男性的一些好處，然後女性主義那方面又可以幫你解釋掉一些事情，可以讓你覺得比較快樂。」

B 表示女性主義讓他感到最大快樂之處是他知道他的出路在哪裡，沒有那些在別的男人身上經常看到的煩惱。他說：

前一陣子我們高中同學辦個同學會，很明顯他們的煩惱對我來說都不是問題，他們擔心現在養個小孩要多少錢、有房貸有老婆要養（就算要，也未免擔心得太早了吧）、擔心跟女朋友不會長久，這都是將父家長制的[patriarchal]婚姻與愛情的長久當作理想的唯一出路所致，束縛自己，對於一些反主流的生活可能毫無眼界，相形之下我自由快樂多了。

上述案例，說明了女性主義可以帶給男人怎樣的利益或解放，然而女性主義論述也可以讓男人從性別事件中看到自身在性別結構所處的有利位置與所享有的特權。J 看到自己與妹妹受到待遇的差異。他要大學聯考前壓力很大，其實還不知道自己真正的興趣在哪裡，可是大家都在談熱門科系，聽到的答案都是「可以有比較穩定的職業，然後女孩子也比較願意跟你之類的」，他愈想愈可怕，壓力也就愈大。可是當他妹妹要升學的時候，家裡卻說：「妳隨便讀就好，不然去做工，趕快賺錢，到時候找個有錢的丈夫嫁掉」。他自己重考的期間可以爭取住到補習班的宿舍以專心讀書，而妹妹重考的時候，家裡卻盯的緊緊的，包括與朋友的往來、對於成績的計較。經由大學裡的性別課程、教會中的女性讀書小組持續接觸女性主義論述之後，他一方面同情妹妹的處境，一方面也意識到做為男人的壓力，結果他同時也看到了自己做為男人的優勢處境。比如家裡在分配一些東西的時候，很明顯家裡都會比較站在他這邊，於是就會主動幫妹妹爭取。他說以後如果分遺產，他也會主動幫妹妹爭取屬於她的那一份。

從男性利益評估的角度來看，女性主義可以讓那些非傳統男性得到性別角色桎梏的解放、污名的去除；反過來說，對於從小在非傳統家庭中成長（例如要做家事、洗碗等）的男性，或者沒有處在異性戀親密關係中的男性而言，則比較不必為女性主義實踐付出較大的代價，或者說損失的特權比較少。因此，上述這些男人也比較可能接受女性主義。

女性主義如果不符合男性利益，那如何說服男人參加性別論述與運動？然而弔詭的是，如果只單方面的強調傳統男性氣概對於男人造成的傷害，而迴避了女性受害更為深廣的事實，則性別結構不但沒有受到挑戰，反而會走上西方男權主義的路途，責怪女人或女性主義讓男人受傷。美國的男性解放運動可以給予我們借鏡。他們（men's lib-ers）認為傳統男人（traditional men）把所有的情感吞進去，又將憤怒向外發出；他們不是完全否認情感，就是不知道怎麼表達情感。而改變中的男人（changing men）則努力尋求表達情感的能力。然而他們從學習感覺中獲得快樂，卻忽略了思考男人與女人的關係。也就是過度注重自我表達，卻忘了挑戰性別歧視，以及男性的既得利益位置（status quo）（Lichterman, 1989）。美國

的男性團體因而被迫分家，治療成長團體與支持女性主義（profeminist）團體從此分道揚鑣。

反過來 Brod（1998）也指出，支持女性主義一定要站在肯定男人的立場，否則女性主義者就是要男人硬了心腸，對男人的痛苦視而不見，似乎覺得給男人一點同情就會減低其對女性主義的投入。這是一件弔詭的事情，因為為了女性主義，男人反而要減低對人的敏感、降低其人性的部分。他覺得承認並且正面看到男人所受的苦，正是有能力去抵抗男人所造成的痛苦的基礎。不過我們在讀到這段 Brod 肯定男人痛苦經驗的同時（頁 205），也絕對不要忘了他在更早期所說的，權力會限制一個人的視野，我們同時需要宰制者與受壓迫者的聲音。男人可以更為正確的描述自己的經驗，但是一定要放在女性所經驗的脈絡中來理解（頁 203）。這一點對於從事男性研究的男性研究者或實務工作者尤其重要，否則只知在訪談的過程中聆聽中產階級的男人訴說做「好男人」的壓力，或者性侵害的加害者訴說成長中的痛苦經驗，結果卻迴避了性別結構的分析，反而走上維護男權之途。事實上，男人受到壓迫，絕對無法減損男人對於女人嚴重而可怕的壓迫（New, 2001）；不能因為自身也受到壓迫，就可以不必對自己壓迫別人的事實負責。New 認為男人應該尋求男人的解放利益，建構新的性別秩序，以同時符合男人與女人的需求與利益。

## 關係利益

在男人日常生活的處境當中，免不了會與許多女人有緊密的關係，例如母親、女兒、妻子、姊妹、姑姨、女性朋友、女同事等。男人可能會希望他的太太在工作場合中不受到歧視、女兒出門不會遭受性侵害。然而男人在關心性別平等時，也會因為這種與女人的關係，使得其利益衡量變得更為複雜。例如 Davis 與 Robinson（1991）的研究指出，太太在上班的男人，比較能夠知道女性在職場上受到的性別歧視，同時關心家庭的收入，因此會主張性別平等。然而也正因為太太上班，所以自己就有較大的壓力要分擔家務，因此他會比較不關心性別平等。她們的經驗研究發現兩相權衡之下，家庭收入還是比較重要。

E 觀察到家中祭拜祖先的種種事務責任都落在媽媽身上，他覺得明明是夫家的祖先，為什麼爸爸可以不用忙東忙西，媽媽卻要擔負起各種責任，這樣對女人實在不公平。S 升上國中後，開始發現家中空間分配不公平，「我已經有自己的房間，可以做我自己的事情，我可以偷看漫畫，只要把門關起來就不容易被發現。可是二個妹妹卻要共用一個房間，沒什麼個人的隱私，更別說偷偷作什麼事情了。」



當時他還沒有接觸過女性主義，只知道大人分配的空間不公平，卻沒有能力清楚地描述問題的所在，只能以空間不足的限制作為解釋的理由。當然，也可能是當時他「沒有勇氣，大概是潛意識裡知道，如果我說出來了，如果事情因此而改變了，那我既得的利益就受到傷害了，所以也沒有說出口。」J 同樣提到無論就讀書、住宿、與行動能力，他都獲得比較好的待遇，因而同情妹妹的處境，替她打抱不平。此外，前面提過 H 與 W 的母親都曾遭受某種程度的家庭暴力，因此給他們很大的追求性別改革的動力。

## 政治利益

從社會運動的角度來看，Connell (1998) 指出為了性別關係的正義而戰，很弔詭的，正好和追求男性運動背道而馳。因為要挑戰性騷擾與性侵害、薪資平等、同性戀恐懼等正義議題，免不了會分離不同的男人而不是讓所有的男人團結起來。我認為 Connell 此種觀點的基礎在於，男人無論如何還是處在性別關係中的優勢位置，所以不可能像女人一樣，因為性侵害等經驗而有命運共同體的察覺，進而集結並採取行動。然而如果如 Graham 所言，所有的男人不管是不是在具體行為上曾經侵犯過女人，都還是要面對與挑戰內在的強暴犯 (the rapist within) (引自 Pease, 2000, 頁 43)，則所有男人其實是站在同一個性別位置之上的。只是這種反省過後的認知，要成為集結男人的共同基礎，恐怕還是非常困難。在本研究的受訪者之中，前曾提過 K 因為長期參與學運、社會運動，篤信平等價值，讓他無法迴避性別的問題。S 開始閱讀性別書籍，是帶著英雄主義，要替弱勢打抱不平。B 也說明男人不需要有特殊的性別遭遇才會走向性別運動之途，因為女性主義無它，就是「一場公平正義之戰」，任何正常人都應該「感知到這個父權，進而批評它」。

公平正義的信仰讓一個人容易接受女性主義，看見女性集體在父權體制中受到不平等待遇與壓迫，然而弔詭的是，它同時也是讓人迴避女性主義論述的原因。L 認為所有的運動與制度改革都要以人本目標。女性主義只是切入社會問題的一種方式，而人本主義則是它的哲學基礎。他認為刻意的強調性別觀點，偏離了人本，就可能走偏了。L 的說法，讓我想起社會上經常出現的回應性別事件的看法，「這不是性別問題，是人性的問題。」無論是性侵害、勞動性別分工、薪資不平等的問題，他們都會說，他們追求的是人性，只要每個人都能夠尊重他人，事情就都解決了，哪裡有性別的問題。這種高舉崇高的人性或人類烏托邦的想像，其實迴避了此時此刻真實的性別結構問題，結果變成用「人本」的理由，來「稀釋」

性別的問題。換一種角度來說，人本的說法有時過於唯心，忽略了性別結構中的權力與物質條件的問題。更甚者，有的人用公平的理由，深怕女性主義成爲一個新的霸權，結果就對男性太「不公平」了。

Pease (2002) 以美國的情況指出，很多參加「男人反性侵害」團體的男人，其動機經常是覺得應該要對強暴女人的「別的壞男人」做些什麼。然而這樣的想法經常模糊了自己做爲性侵害結構共犯的事實。Graham 因此強調男人應該要面對並挑戰內在的強暴犯 (引自 Pease, 2000)，藉以幫助男人理解自身是參與強暴文化的共犯。否則，只是將箭頭指向其他壞男人，把問題拋出，卻忽略了承認自身的共犯參與。改變男人的過程因此包括承認自身具壓迫性的想法與感覺，並且承認在成長過程中學習而來的對女人的恨意與輕視。這樣看來，如果只以公平正義的訴求對外宣戰，而沒有將女性主義知識的箭頭對準做爲男人自身的反省，則男人的改變仍然是很有限度的。

我們再回到個人利益 (personal interest) 與政治利益 (political interest) 之關係的問題。Pease (2002) 認爲可以用道德理由來鼓勵男人去除特權，但是他也提醒如果只是爲了道德理由，會造成怎樣的後果？會不會壓抑了男人的需要與慾望？這樣的男人如何處理正義與既得利益之間的衝突？基於純粹道德正義的訴求，如何能夠不斷地注入男人參與性別改革的動力。Brod (1988) 也認爲男人不能只做對自己有利的時候，但是他又同時指出以自我犧牲的利他主義作爲政治運動的基礎是不夠的，因爲能量總是會不足。因此我們需要釐清女性主義雖然需要男人放棄一些權利，而且跟男人的短期利益有衝突，但是長期終究會爲男人帶來 (啓發) 利益。Gross, Smith 與 Wallston (1983) 根據其對於六、七〇年代美國社會運動的研究，發現那些能夠存活下來的男性團體，通常是那些能夠同時滿足政治與個人目的的團體。Pease (2002) 覺得男人究竟是爲了自身的利益或者是爲了道德理由而參與女性主義，這是問錯了問題。重要的是男人的利益是如何建構起來的，以及如何再建構。他利用工作坊等形式來重新理解男人的痛苦。直到男人的痛苦與受傷得到認可之後，男人才能認識到自己的特權。當然這樣還不夠，我們還需要具體的策略來連結男人的痛苦與他們在性別關係中的權力位置。當男人積極地經由政治參與來挑戰社會的性別關係時，男人重新建立自己的主體位置，也重新界定男人的利益。此時道德不是外加的，亦即並不是藉由道德來阻止男人做原來想要做的事情，而是要重新建構男人作爲道德存在者的自我利益，以使男人的所作所爲能夠同時符合個人與政治的目標。

## 結論

本研究提出了男性性別意識形構的七個面向：1. 傳統男性角色的束縛與壓迫，2. 女性的受歧視與受壓迫經驗，3. 重視平等價值的成長經驗，4. 女性主義論述，5. 男性/個人利益，6. 關係利益，7. 政治利益。大多數受訪者的性別意識都同時牽涉了此七種面向。一方面在自身的生活經驗中主觀感受到傳統男人角色的束縛，或者自身追隨社會男性氣概的建構，但是隨著社會性別價值觀的演變，反而又受到身邊女性的質疑與挑戰。受訪者幾乎都提到社會中或是身旁女性受到性別體制的歧視與壓迫經驗；也都受到女性主義論述的啟發，不管是經由身邊的女性主義者、大學修課、參加讀書小組，或其他的媒介。大部分受訪者因為看到女性受到壓迫，所以認為要還女性公道，改善女人的社會性別處境。然而參與女性主義的深度與廣度，又受到他在其中能夠獲得多少利益，相對付出多少代價，甚或是否能夠反省自身在性別結構中的特權位置所影響。

這七種面向，並沒有一種固定的線性關係，而是彼此相互影響。有的人從自身主觀受到壓迫的經驗出發，尤其是娘娘腔與男同性戀；有的人是先看到身旁女性受到不平等甚至暴力對待；有的人則是因為修課的關係意外接觸了女性主義論述，然後才看到身邊的性別經驗。有的人因為追求公平與正義，參與各種的社會與政治運動，然後順理成章走進婦女運動的領域。性別意識的發展也沒有一定的階段或是有一個終點，它是一個不停的折衝與協商的過程。有的人因為熱心參與婦女運動，卻遭受女性主義者質疑甚至嘲諷；有的人不願意接受傳統男性角色的安排，放棄學醫，沒有想到這正是女朋友家長反對他們交往的重要因素；有的人毅然決然的選擇就讀婦女研究，沒有想到這個學位無法幫助他找到適當的性別相關工作，卻成為尋找其他工作的阻礙；在這樣的過程中，他們不時要重新思考自己與女性主義的關係，調整下一步的行動。有人在參與婦女團體反雛妓遊行當中，第一次在公共空間中大聲的喊出「我是同性戀！」；也有人從女性主義中獲取養分，更加深自己的同性戀認同，但是後來又因為某些婦女團體與同性戀劃清界限而感到憤怒與沮喪。正如 Griffin (1989) 以及 Stanley 與 Wise (1993) 所言，性別意識不是一個線性過程，而是循環或螺旋進展的，沒有一定的起點與終點，只有永無休止的流動。

當然在這七個男性性別意識的構成面向中，每個人在不同的時空中所著重的面向也可能有所不同。多數受訪者的性別意識同時牽涉這七個面向，然而根據研究發現此節一開始我所使用的架構圖，可以理解有的人可能只牽涉到圖中的下半

部。也就是他並沒有主觀察覺到自身因為做為男性而受到壓迫，然而他因為目睹社會或親密關係中的女人受到壓迫，再加上透過女性主義論述對於性別結構進行反思，他很清楚知道社會對女性集體是不公平的。基於道德感，他願意參與政治行動來改善女性的處境，然而他並沒有深入地反省女性主義或女性集體處境與自己的關係何在？舉例來說，他可能會譴責少數的男性強暴犯，甚至義憤填膺，但是不見得看得見自己在性別歧視結構中的共犯位置，或者自己擁有多少做為男人不勞而獲的特權。另一種人則可能只牽涉圖中的上半部，他可能深深為不符合傳統男性角色而苦，甚或受到嚴重壓迫，透過女性主義論述獲得自身解放的力量與快樂，然而他可能並沒有看到女性受壓迫的問題。正如同性戀運動中，仍然有人有拒 C (sissy, 女性化) 情結，崇拜陽剛特質。這裡我們男人必須提醒自己，不要成為一心想要解救小紅帽的獵人（忽略自身的共犯角色），也不要重蹈西方男權主義者的覆轍（只關心男人的創傷，卻對女性的痛苦視而不見）。

既有的女性性別意識研究，強調女性察覺到自身的受害經驗、接觸女性主義或婦女團體、採取政治行動以改善女性集體的處境。至於本研究的男性受訪者，有的人主要出自於自身的受害經驗，有的人是察覺身旁女性的受害經驗，有的人則是同時都有。所有受訪者都提到女性主義論述對他們的影響，論述的來源有課程、書籍、身邊的女性，但是沒有提到是受到身旁男性女性主義者示範的影響。相對地，Christian (1994) 關於「反性別歧視男人」研究中的受訪者，則有相當的比例是參與男性團體，並且在其中接觸了女性主義論述。反觀台灣，婦女運動蓬勃發展二十餘年，解嚴之後各種婦女團體應運而生，並且非常活躍地致力於各種政治行動。然而目前雖然也有些男性團體的成立，例如紳士協會、娘娘腔關懷協會、中華 21 世紀男性成長協會等，但是他們較關心男人個體的成長與福祉，與女性主義對話並不多，也沒有與婦女運動結盟。台灣大學婦女研究室雖然在 2000 年曾經以男子氣概系列演講、座談會、出版小冊子、記者會、在報刊撰文等形式推動台灣的白絲帶運動（畢恆達，2000），算是與女性主義比較接近的運動，但是力量與影響畢竟有限。從國外男人參與女性主義與婦女運動的經驗看來，如何在不同地域層級推動支持女性主義的男性團體成立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有不少的受訪者，在大學求學過程當中，是因為大一英文或通識課程而遭逢女性主義，深深為之震撼，然後才進入女性主義的領域。當然開設性別課程非常重要，然而在眾多男性對女性主義、婦女、性別這樣的名詞仍有疑慮或排斥時，如果有更多的老師在一般課程中加入性別觀點或議題的深入討論，相信會對更多的男性產生影響。

最後回到文獻回顧所言，男性可不可能發展出男性共同命運的男性意識？相

對而言，女性比較容易透過教育、意識喚醒團體等，對自己過去受到社會性別歧視的經驗提出新的解釋，意識到身為女性所共同需要面對的處境。然而，男性雖然也會意識到身為男性所受到的社會性別價值觀的桎梏，但是要男性意識到身為男性的既得利益的部分就很不容易。Kimmel 說的好，男人的性別盲（gender blindness）正是出自於男人沒有能力看到自己是男人。男人是規範（norm），是既得利益者，所以男人看到自己是人（human being），而不知道自己也具有性別（引自 Whitehead, 2002, 頁 81-82）。

大多數男性無論基於知識興趣、社會關懷，或者有受害或具有性別意識的女性親友，而接觸女性主義，其實他們所發展出來的比較不是男性的群體意識，而是分析性別結構的知識，以及同理女性受害處境的能力。而同性戀者則發展出同性戀認同，從女性主義中獲取知識養分以及運動的能量，與女性並肩對抗異性戀父權。倒是受訪者 J 比較特別，是站在男性的本位認同男性。他參加教會團契的女性讀書小組，深感身邊的男同學，雖然很聰明，但是生活的品質卻很低落。工學院是一個以男生為主的學習環境，

因為你的周圍都是男生，所以說性別的觀念其實是很清楚的在那種環境下被塑造的。比如說大家無聊，就用電腦看光碟啊，或是去網路上抓圖片，在網路上找女孩子 talk 之類的。他們事實上關心的是要怎樣能夠追到某一個女孩子，或許他們會對她很好，對她們很好就是用他們想像的方式去做，把她套進來你缺的那根肋骨，就是那個樣子。他們往往要求就是基督徒、又要會彈琴，會很聽話…。

他覺得這些男同學其實是很壓抑而不快樂的。而這些不快樂就轉移到一些團體活動上去，「比如說大家一起去看棒球、撞球、打保齡球、或是一群人去聯誼。」然後他的男同學一有感情上的挫折就找他哭訴，或者要他幫忙介紹女朋友。因此他希望研究到底是怎樣的社會會塑造出這樣的男人，「希望我也能夠幫助一些男性朋友，讓他們可以活得快樂一點。」

總結而言，男人要談論性別，自身經驗就必須時時受到檢驗。如果沒有切身的經驗來支持，很難對性別論述有持續的投入。然而個人有關性別的成長經驗，無法自然而然地發展出性別意識，需要藉由論述對於成長經驗提出新的理解；當然，對於女性主義論述的堅持，也需要有切身的成長經驗來作為基礎以及推進的動力。

Whitehead (2002) 以其對於英美性別處境的理解，認為所有男人都已經或者遲早要面對他們與女性主義所帶來的發問、批判和需求之間的關係。台灣的婦女

運動也許不比英美國家，能夠對社會產生如此廣大而全面的衝擊，然而傳統的男子氣概與實踐，畢竟和女性主義以及更多正在改變中的女性對於男人的期待有所衝突。如何對傳統男人進行挑戰，進而帶來改變與平等，是女性主義與婦女運動一直關心的目標。本文即以那些已經不再將性別視為理所當然，而願意深刻面對性別議題的男人進行研究，也就是探究性別如何從男人生命中的背景（ground）逐漸變成前景（figure）的過程。本文的討論比較集中在性別意識受到啓蒙與形成的階段，至於有了性別意識覺醒之後，這些男人如何處理他與身邊女性的互動關係、身旁的男人如何看待他、實踐性別平等過程中的代價與獲得，受到論文篇幅的限制，本論文只有很簡單的描述，深入分析與討論當是下一篇論文所要處理的內容了。

## 註釋

- (1) 本研究由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完成（NSC87-2413-H002-003），初稿曾在 1999 年 5 月 20 日的「1999 性別與兩性研討會」上發表。作者非常感激所有受訪者願意與我分享其生命經驗、研究助理楊長苓與簡淑媛協助資料蒐集與討論，也謝謝《應用心理研究》二位匿名審查者、責任編輯張慈宜，以及唐筱雯、楊佳羚與那群「男男自語」的朋友們的剴切意見與建議。

## 參考文獻

- Harding, S. (1999):〈男人是否可以成為女性主義思維的主體〉。《當代》(台灣), 142期, 76-80。
- 王世哲(2000):《男性情慾之研究—以中年已婚男性為例》。高雄師範大學成人教育研究所, 碩士論文。
- 王舒芸、余漢儀(1997):〈奶爸難為：雙薪家庭之父職角色初探〉。《婦女與兩性學刊》(台灣), 8期, 115-145。
- 王雅各(1998):〈大學學生社團中男性社員的性別意識及其影響〉。《本土心理學研究》(台灣), 9期, 245-277。
- 王叢桂(2000):〈促進參與父職因素的探討〉。《應用心理研究》(台灣), 6期, 131-171。
- 布魯斯(2002):〈讓同志身份成為快樂的源頭〉。見莊慧秋(主編):《揚起彩虹旗：我的同志運動經驗 1990-2001》(頁 212-217)。台北：心靈工坊。
- 朱嘉琦、鄔佩麗(1998):〈台灣婦女女性意義發展歷程之研究：以三位女性主義者的生命故事為例〉。《教育心理學報》(台灣), 30卷, 1期, 51-71。
- 吳書昀(2002):《性別意識的發展歷程：以婦運參與者為例之研究》。高雄師範大學輔導研究所, 碩士論文。

- 李芳如 (2001):《新好男人：雙生涯家庭男性家務分擔經驗之研究》。嘉義大學家庭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李惠恩 (2002):《非傳統科系的選擇：家政領域學生就學經驗之探討》。台灣師範大學家庭教育教育學系，碩士論文。
- 林昱貞 (2001):《性別平等教育的實踐：兩位國中女教師的性別意識與實踐經驗》。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碩士論文。
- 施悅欣、陸偉明 (2002):〈教師與學生之性別意識：以一個性別相關課程為場域〉。《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台灣)，14 期，275-311。
- 徐宗國 (2001):〈拓邊照顧工作：男護士在女人工作世界中得其所〉。《台灣社會學刊》(台灣)，26 期，163-210。
- 秦光輝 (1997):《「當兵」現形記：從臺灣男性兵役經驗看軍隊父權體制再生產的性別邏輯》。清華大學社會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畢恆達 (編) (2000):《白絲帶運動：男人參與終止性(別)暴力》。台北：台灣大學人口與性別研究中心婦女研究室。
- 陳佑任 (2002):《他們的故事：三位國小男性教育人員的生命史研究》。新竹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陳若璋、劉志如 (2001):〈五類型性罪犯特質與預測因子探討〉。《中華心理衛生學刊》(台灣)，14 卷，4 期，59-98。
- 黃淑玲 (1999):〈從酒色應酬文化看台灣社會的男性特質〉。高雄醫學院主辦「1999 性別與兩性研討會」(高雄) 宣讀之論文。
- 楊政議 (1998):《台灣男丁格爾的觀點：專業生涯發展路徑》。台灣大學護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葉明昇 (1999):《男性社會工作者之職業選擇歷程》。高雄醫學院行為科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達努巴克 (2002):〈擁抱玫瑰少年〉。見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 (主編):《感謝那個性騷擾學生的男教授》(頁 145-158)。台北：女書。
- 裴學儒 (2001):《軍隊文化、男性氣概與性傾向壓迫：台灣男同性戀者的兵役經驗分析》。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
- 鄭漣姣 (2000):《女性教學者女性意識轉化及其教學實踐之研究》。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Bartky, S. (1998). Foreword. In T. Digby (Ed.), *Men doing feminism* (pp. xi-xiv). New York: Routledge.
- Bergling, T. (2001). *Sissyphobia: Gay men and effeminate behavior*. New York: The Haworth Press.
- Brod, H. (1987). Introduction: Themes and theses of men's studies. In H. Brod (Ed.), *The making of masculinities: The new men's studies* (pp. 1-17). Boston: Allen and Unwin.
- Brod, H. (1998). To be a man, or not to be a man: That is the feminist question. In T. Digby (Ed.), *Men doing feminism* (pp. 197-212). New York: Routledge.

- Canaan, J. E., & Griffin, C. (1990). The new men's studies: Part of the problem or part of the solution? In J. Hearn & D. Morgan (Eds.), *Men, masculinities and social theory* (pp. 206-214). London: Unwin Hyman.
- Christian, H. (1994). *The making of anti-sexist men*. New York: Routledge.
- Clatterbaugh, K. (1997).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on masculinity: Men, women, and politics in modern society* (2nd ed.).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 Connell, R. W. (1987). *Gender and power: Society, the person and sexual politics*. Oxford, UK: Polity Press.
- Connell, R. W. (1998). Gender politics for men. In S. P. Schacht & D. W. Ewing (Eds.), *Feminism and men: Reconstructing gender relations* (pp. 225-236).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Cornish, P. A. (1999). Men engaging feminism: A model of personal change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The Journal of Men's Studies*, 7(2), 173-199.
- Davis, N. J., & Robinson, R. V. (1991). Men's and women's consciousness of gender inequality: Australia, West Germany, Great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6, 72-84.
- Digby, T. (1998). Introduction. In T. Digby (Ed.), *Men doing feminism* (pp. 1-14). New York: Routledge.
- Downing, N. E., & Roush, K. L. (1985). From passive acceptance to active commitment: A model of feminist identity development for women. *The Counseling Psychologist*, 13(4), 695-709.
- Gerson, J. M., & Peiss, K. (1985). Boundaries, negotiation, consciousness: Reconceptualizing gender relations. *Social Problems*, 32(4), 317-331.
- Goldrick-Jones, A. (2002). Men who believe in feminism. London: Praeger.
- Griffin, C. (1989). 'I'm not a women's libber, but...': Feminism, consciousness and identity. In S. Skevington & D. Baker (Eds.), *The social identity of women* (pp. 173-193). London: Sage.
- Gross, A. E., Smith, R., & Wallston, B. S. (1983). The men's movement: Personal versus political. In J. Freeman (Ed.), *Social movements of the sixties and seventies* (pp. 72-81). New York: Longman.
- Gurin, P., & Townsend, A. (1986). Properties of gender identity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gender consciousnes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5, 139-148.
- hooks, b. (1984). *Feminist theory: From margin to center*. Boston: South End Press.
- Hyde, J. S. (2002). Feminist identity development: The current state of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 *The Counseling Psychologist*, 30(1), 105-110.
- Klatch, R. E. (2001). The formation of feminist consciousness among left and right-wing activists of the 1960s. *Gender and Society*, 15(6), 791-815.
- Lichterman, P. (1989). Making politics of masculinity. *Comparative Social Research*, 11,



185-208.

- Mac an Ghaill, M. (1994). *The making of men: Masculinities, sexualities and schooling*. Philadelphia: Open University Press.
- Morgan, D. H. J. (1992) *Discovering men*. London: Routledge
- New, C. (2001). Oppressed and oppressors? The systematic mistreatment of men. *Sociology*, 35(3), 729-748.
- Pease, B. (2000). *Recreating men: Postmodern masculinity politics*. Thousand Oaks, CA: Sage.
- Pease, B. (2002). (Re)constructing men's interests. *Men and Masculinities*, 5(2), 165-177.
- Pharr, S. (1988). *Homophobia: A weapon of sexism*. Inverness, CA: Chardon Press.
- Rinehart, S. T. (1992). *Gender consciousness and politics*. London: Routledge.
- Schacht, S. P., & Ewing, D. (1997). The many paths of feminism: Can men travel any of them? *Journal of Gender Studies*, 6(2), 159- 176.
- Schutz, A. (1964). *Collected papers*.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 Seidler, V. J. (1994). *Unreasonable men: Masculinity and social theory*. New York: Routledge.
- Stanley, L., & Wise, S. (1993). *Breaking out again: Feminist ontology and epistemology* (new ed.). New York: Routledge.
- Whitehead, S. M. (2002). *Men and masculinities*.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 Wilcox, C. (1997). Racial and gender consciousness among African-American women: Sources and consequences. *Women and Politics*, 17(1), 73-94.

初稿收件：2002年7月3日      二稿收件：2003年1月8日  
三稿收件：2003年2月10日      審查通過：2003年2月14日  
責任編輯：張慈宜

作者簡介：

畢恆達      美國紐約市立大學博士（環境心理學）  
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副教授  
通訊處：(106) 台北市羅斯福路四段1號  
                 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電話：(02) 23638711 轉 42  
傳真：(02) 23638127  
E-mail：hdbih@ccms.ntu.edu.tw



## **The Formation of Men's Gender Consciousness**

**Herng-Dar Bih**

*Graduate Institute of Building and Planni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en's studies have a very short history in Taiwan; moreover, research on men's gender consciousness has been neglected.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how men are concerned with and involved in gender issues in a patriarchal society. By interviewing nineteen men, we found that men's gender consciousness originates from their experiences of 1) the constraint and domination of traditional masculinity, 2) women's experiences of discrimination and oppression, 3) a democratic and equal environment. However, their daily experiences need feminist discourses to be interpreted. Men's pursuit of gender equity is a matter of personal politics by considering the interrelationship among 1) personal interest, 2) relational interest, and 3) political interest. These seven facets are intertwined without a linear progression. Hence, gender consciousness is constantly evolving without a fixed origin and end.

**Keywords:** gender consciousness, men's studies, feminisms